

土耳其周边外交中 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

邹志强

摘 要：受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等因素的复合驱动，十余年来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经历了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土耳其试图将土库曼人扶植为本国的地区代理人，服务于其周边外交目标的实现。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内政、打击库尔德人和推行地区干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伊拉克，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制衡库尔德地区的独立野心，保持土在伊北部的影响力。然而，受到叙伊国内局势、土库曼人族群特征、土与叙伊两国中央政府及库尔德人之间复杂关系的影响，土耳其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代理人色彩更浓厚，伊拉克土库曼人的伙伴角色则较为模糊和尴尬。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乃至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土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加剧了其国内政治与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

关键词：西亚土库曼人；土耳其；周边外交；叙利亚；伊拉克

作者简介：邹志强，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 200433）。

文章编号：1673-5161(2023)02-0071-19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东难民问题治理研究”（20BGJ077）的阶段性成果。

民族身份认同与构建问题不仅影响国内政治进程,也深刻影响着地区国际关系。中东国家普遍存在大量少数民族,如何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构成了影响中东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因素之一。^① 大多数中东国家的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关系较为紧张,存在不少跨界民族,非主体民族则往往处于附属地位,遭到排挤和边缘化。^② 因此,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和民族政策的缺陷之一表现为对少数民族缺乏包容性,局势动荡时期少数民族易基于民族身份被动员起来,并为外部国家介入提供空间,族群身份认同往往呈现出高度的政治化特征。同时,中东少数民族大多面临身份认同的困境,在动荡地区局势中的政策选择不仅攸关本族群的前途命运,也影响所在国形势和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与外部力量的联系进一步加剧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生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北部以及土耳其中部、黎巴嫩北部等地的土库曼人(即“西亚土库曼人”或“中东土库曼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西亚土库曼人与中亚土库曼人在族群、经济、文化、语言等方面长期处于隔绝和孤立发展的状态,两者是经过明显分化的族群,既无直接联系,也无共同的族群认同。^③ 一般认为,西亚土库曼人是 10 世纪以后陆续迁入并生活在当地的突厥人后裔,他们先后为马穆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服务,历史上长期缺乏独特的民族身份。当一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这些世代居住在当地的土库曼人大多选择滞留当地,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民族。因此,奥斯曼帝国崩溃和被划入其他国家是西亚土库曼人族裔身份的现代起源。^④ 由于官方统计数据长期匮乏,对于西亚土库曼人人口规模的估计存在巨大差异,总体数量在 300 万至 700 万之间,其中伊拉克和叙利亚土库曼人的数量最多,^⑤土库曼人成为两国境内仅次于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第三大民族。西亚土库曼人多数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也有部分土库曼人信奉什叶派。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以及所在国政府的压制与同化,西亚土库曼人

① 张燕军:《中东国家建构中的少数民族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 年第 3 期,第 76 页。

② 冯璐璐:《中东民族问题 理论边界与议题建构》,载《中东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191 页。

③ 成振海:《伊拉克土库曼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政治前景探析》,载《世界民族》2019 年第 3 期,第 100 页;Larry Clark, *Turkmen Reference Gramma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8, pp. 8-11.

④ Tunahan Yıldız and Zana Çitak,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Iraqi Turkmen Refugees in Turke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2, 2021, p. 342.

⑤ 土库曼人人口规模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伊拉克土库曼人的规模最低估计在 80 万左右,最高估计达 300 多万;叙利亚土库曼人最低估计为 20 万左右,最高估计为 300 多万。一般认为,伊拉克土库曼人多于叙利亚土库曼人。

虽然保留了族裔身份认同,但多已改说阿拉伯语,并自认为是所在国公民。21世纪以来,主要生活在叙伊两国的西亚土库曼人受到巨大冲击,经历了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持续动荡、叙利亚长期战乱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肆虐,在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中急切寻找自身的角色定位。西亚土库曼人被称为“奥斯曼帝国的孤儿”和“双重少数民族”,现实中因其与所在国及土耳其的双重关系被认为是处于“两个政治中心的边缘”。^①

国内外学界对西亚土库曼人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民族与难民、地区国际关系三个角度开展。一是从历史角度对西亚土库曼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东国家的民族问题和国家构建问题以及对库尔德人历史的研究成果之中,特别是对伊拉克土库曼人历史的相关研究。^②二是从民族和难民角度对冷战后西亚国家土库曼人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研究。^③由于地区国家形势动荡和安全环境恶化,作为弱势族群的土库曼人受到严重影响而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叙利亚和伊拉克国内冲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都使这一群体深受伤害。三是从地区国际关系角度对周边国家与土库曼人关系的研究,聚焦土耳其与土库曼人的密切互动,认为受到土耳其支持的土库曼政治组织和

^① Robert Cribb and Li Narango, “Orphans of Empire: Divided Peoples, Dilemmas of Identity, and Old Imperial Bord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46, No. 1, 2004, pp. 164–187.

^② 参见 Shams Inati, *Iraq: Its History, People and Politics*,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3; Ershad Al-Hirmizi, *The Turkmen and Iraqi Homeland*, Kerkuk: Kerkuk Foundation, 2003; A. Gökhan Kayili, *The Iraqi Turkmen (1921–2005)*, Ankara: Bilkent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2008; Liam Anderson, Gareth Stansfield, *Crisis in Kirkuk: The Ethnopolitics of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参见成振海:《伊拉克土库曼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政治前景探析》,载《世界民族》2019年第3期; Suphi Saatçi, *Tarihten Günümüze Irak Türkmenleri*, Istanbul: Ötüken Neşriyat, 2003; Ershad Al-Hirmizi, *The Turkmen and Iraqi Homeland*, Tank H. Oğuzlu, “Endangered Community: The Turkoman Identity in Iraq,”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4, No. 2, 2004; Ibrahim Sirkeci, “Turkmen in Iraq and Their Flight: A Demographic Question,” *Centre for Middle Eastern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21, 2011; Erşat Hürmüzlü, “The Turkmens of the Middle East,”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4, No. 1, 2015; Salih Moustafa, “Kirkuk Conflict in Its Ethnic/Political Media: the Turkmen Newspaper Alqal’a as a Model,”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8, No. 3, 2016; Şafak Oğuz, “Turkmens: Victims of Arabization and Kurdification Policies in Kirkuk,” *Gazi Akademik Bakış*, Vol. 9, No. 18, 2016; Joseph Ataman and John Owens, “The Turkmen of Iraq: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12, 2017; Tunahan Yıldız & Zana Çitak,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Iraqi Turkmen Refugees in Turkey,”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3, No. 2, 2021.

武装团体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日益活跃。^① 相对于前两方面的研究,从外交和国际关系角度对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关系的学术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本文尝试探讨二者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西亚土库曼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

一、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相互“再发现”

从奥斯曼帝国崩溃到 20 世纪末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世代居住在当地以及与面向西方的现代土耳其缺乏联系,周边国家的土库曼人对土耳其的认同并不高,反而更认可所在国的公民身份。与此同时,土耳其似乎也遗忘了这些“奥斯曼遗民”,正发党上台前的土耳其政府并不情愿卷入中东地区政治,偶尔的介入基本上都是因为库尔德问题。^② 正发党上台之后,土耳其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转变,致力于追求中心国家地位和大国角色,周边地区在外交格局中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其周边外交日益受到大国抱负这一新的国内因素的驱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库尔德问题和大国抱负两大内部因素推动下,土耳其加快了“回归中东”^③的步伐,周边外交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强势介入叙利亚、利比亚、外高加索等热点问题,显著提升了土耳其在周边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土耳其的中东外交是其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核是“新奥斯曼主义”,志在谋求地区大国身份,其“泛伊斯兰主义”和“新奥斯曼主义”色彩凸显。^④ 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为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提供了机会。民族、宗教、“土耳其模式”、经济援助和军事干涉等都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重要工具。

随着土耳其“回归中东”步伐加快和地缘政治野心膨胀,加之周边国家陷入动荡,土耳其与邻国的土库曼人之间经历了一段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土库曼人与土耳其人被认为拥有族裔同源关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土库曼

① 参见 Tank H. Oğuzlu, “The Turkomans as a Factor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 3, No. 2, 2002; Mazin Hasan, “The Turkmen Policy of Turkey: Needs to be Done,” *Stratejik Analiz*, Vol. 31, No. 121, 2003; Güldem Baykal Büyüksaraç, “Trans-border Minority Activism and Kin-state Politics: The Case of Iraqi Turkmen and Turkish Interventionis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90, No. 1, 2017; 李亚男:《中东土库曼人:流浪的突厥?》,载《世界知识》2016 年第 1 期。

② Bill Park, “Turkey’s Kurdish Complex,” *Adelphi Papers*, Vol. 45, No. 374, 2005, p. 11.

③ 参见李亚男:《转向的土耳其:雄心与困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7 年第 7 期,第 13 页。

④ 唐志超:《“光荣孤立”:风暴眼中的土耳其中东政策》,载《世界知识》2020 年第 22 期,第 28 页。

人问题大多被认为是土耳其对两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是所在国“阿拉伯化”和“库尔德化”运动的“受害者”和“挑战者”。^① 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拥有天然的族源关系,受族裔认同驱动,土耳其对叙伊两国土库曼人的信任、支持与重视度上升;两国土库曼人对土耳其和突厥身份的认同感也不断增强,在动荡的地区局势中,双方之间形成了新的身份纽带与利益捆绑。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受访伊拉克土库曼人对土耳其有好感,认为土耳其人和土库曼人之间没有任何种族差异,对土耳其表示认同并抱有高度期待。^② 在此背景下,土耳其逐步将邻国的土库曼人转化为推行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抓手。土耳其大力支持伊叙两国的土库曼人争取自身权益,提供军事援助,背后潜藏着自身的地区政策目标,土库曼人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地区角色,但成为土耳其介入地区事务、扩大影响力的工具之一。^③ 总体来看,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认知主要受到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等三大因素的复合驱动。

第一,“新奥斯曼主义”政策背景下土耳其族裔认同的回归。“新奥斯曼主义”基于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强烈认同意识,对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想象是土耳其身份认同最关键的决定因素,并成为土耳其内外政治的主要背景。^④ 受外交转型与地缘政治野心驱使,正发党政府积极推行“新奥斯曼主义”政策,对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统治地区的关注和介入持续加大,特别是对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邻国。“新奥斯曼主义”秉持“战略深度”“多维外交政策”“中心国家”三个原则理念,^⑤ 从地缘政治角度重新设定和拓展土耳其的国家空间、利益和外交目标,具体在外交上表现为更积极进取甚至冒险主义。^⑥ 土耳其自认为对周边地区拥有所谓“历

① Tarık H. Oğuzlu, “The Turkomans as a Factor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pp. 139–148; Tarık H. Oğuzlu, “Endangered Community: The Turkoman Identity in Iraq,” *Journal of Muslim Minority Affairs*, Vol. 24, No. 2, 2004, pp. 309–325; İbrahim Sirkeci, “Turkmen in Iraq and Their Flight: A Demographic Question,” *Centre for Middle Eastern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21, 2011; Şafak Oğuz, “Turkmens: Victims of Arabization and Kurdification Policies in Kirkuk,” *Gazi Akademik Bakış*, Vol. 9, No. 18, 2016, pp. 167–186.

② Tunahan Yıldız and Zana Çitak,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 Case of Iraqi Turkmen Refugees in Turkey,” pp. 345–347.

③ 李亚男:《中东土库曼人:流浪的突厥?》,第39页。

④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vii.

⑤ Gabriela Özel Volfová, “Turkey’s Middle Eastern Endeavor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Neo-Ottomanism Under the AKP,” *Die Welt des Islams*, Vol. 56, Issue 3/4, 2016, p. 494.

⑥ 姚琼瑶:《土耳其“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内涵、目标与前景》,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1年第4期,第99–100页。

史责任”,基于“伊斯兰责任”和“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等“帝国怀旧”情势展开大范围、高强度的外交和军事介入,彰显其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大国抱负。^①在此背景下,同宗同源的叙利亚土库曼人和伊拉克土库曼人受到土耳其的重新发现和高度重视,契合了土耳其国内高涨的帝国情节与政策需求。一方面,从历史角度来看,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信任首先源于二者之间的历史与族裔纽带,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土耳其对这些“奥斯曼遗民”充满感情和责任感,自认为是伊拉克和叙利亚土库曼人的“保护者”,多次宣示不会对土库曼人的安全坐视不管。因此,将伊拉克等周边国家土库曼人与土耳其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是奥斯曼遗产,而不是来自中亚的血缘关系。^②另一方面,从民族角度来看,族裔身份认同重新定义了土库曼人的自我认知,影响了其与外部行为体的关系,“想象的共同体”再次发挥出塑造民族认同的强大威力。土库曼人被土耳其人视为是“边境之外的土耳其人”,土耳其的民族主义团体一直将保护这些“外部的土耳其人”作为一项政治议程。^③土耳其将土库曼人生活的地方视为“外部家园”,通过经济援助、教育支持和政治组织等方式加强对周边国家土库曼人的族裔认同塑造。土耳其前总统阿卜杜拉·居尔曾援引强大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及其对族裔同胞的深厚感情表示:“叙利亚土库曼人是我们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是土耳其与我们的叙利亚兄弟姐妹。”^④因此,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外界普遍认为土耳其介入叙利亚的背后抱有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意图。

第二,土耳其日益增强的大国抱负和“回归中东”战略下的地缘政治追求。“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奉行“回归中东”战略,放弃了之前的“零问题”周边外交政策,^⑤强势干预阿拉伯国家事务,积极推介“土耳其模式”,提升地区影响力,与其他地区大国争夺中东地区领导权,借此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与塑造大国地位。土耳其强势介入中东事务的目的是试图从地区格局变动中寻找机会,按照

① 曾向红、张峻溯:《“帝国怀旧”、地缘政治机会与土耳其外交的转折》,载《外交评论》2022 年第 2 期,第 81 页。

② Suphi Saatçi, *Tarihten Günümüze Irak Türkmenleri*, p. 16.

③ [荷兰]马丁·范·布鲁尼森:《土耳其与摩苏尔省及库尔德人的关系: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到“伊斯兰国”的出现》,刘姜译,载《土耳其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62 页。

④ “H. E. President Abdullah Gül’s Message on the Syrian Turkmen Platform,” *Presidency of the Republic of Turkey*, December 15, 2012, <http://www.tcgb.gov.tr/speeches-statements/344/847-43/h-e-president-abdullah-guls-mebage-on-the-syrian-turkmen-platform.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21 日。

⑤ 参见苏闻宇:《从“战略纵深”看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的转变——兼谈土耳其的国际身份定位》,载《国际论坛》2013 年第 6 期,第 67 页。

本国利益塑造更为有利的地区和国际格局,追求自身的地缘安全和大国梦想,首要目标便是寻求在周边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邻国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获取干涉合法性的重要借口。利用土库曼人介入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提高对两国事务的话语权是土耳其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一环。在叙利亚,土耳其支持土库曼人推翻巴沙尔政权,谋求建立一个亲土的叙利亚新政权,借此获得在叙利亚国家重建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虽然形势不断变化,土耳其一直力保其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长期存在。^① 在伊拉克,土耳其支持土库曼人组织起来,争取更大权益的同时维护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总之,土耳其将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土库曼人视为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抓手与助力,借此成为周边地区“新秩序”的塑造者。

第三,库尔德问题不断凸显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库尔德问题一直是土耳其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长期以来,库尔德问题压缩了土耳其在外交政策上的回旋余地,限制了其外交视野和目标选择,历史和当下事实都反映出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② 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深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无论是建立自治还是图谋分离,都会对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造成很大影响。^③ 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本就是库尔德工人党的长期基地,而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是土耳其的合作伙伴,但也在内外形势推动下不放弃独立梦想,这被视为对土耳其核心利益的威胁。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崛起逐步外溢至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工人党乘机壮大势力,令土耳其深感威胁,转而将阻止库尔德势力的崛起和寻求边境安全作为优先事项,周边外交政策日益受到库尔德问题的驱动而趋于安全化。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生活同一地区,土库曼人的存在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这一心腹之患提供了重要借口和有利条件。在积极介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国内局势的过程中,叙伊两国的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打压库尔德人的重要帮手,二者在共同打击或制衡库尔德人方面互有需求。在伊拉克,土库曼人主张维护伊拉克的领土统一,反对库尔德人独立,这符合土耳其的利益,特别是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倾向上升的时期,土耳其更加重视土库曼人的制衡作用。在叙利亚,土库曼人更是坚决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主张,要求土耳其保护自身安全,积极呼应土耳其建立

① 董漫远:《叙利亚乱局:博弈新态势与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53页。

② Idris Demir, ed., *Turkey'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rab Spring*, Newcastl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7, p. 4.

③ 周丽娅、周少青:《论土耳其库尔德民族问题的“外部性”》,载《学术界》2020年第8期,第172页。

“安全区”的倡议,直接配合土耳其出兵叙北的军事行动,成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势力的合作伙伴和重要帮手。

总体来看,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为土耳其“重新发现”土库曼人提供了深层次的政治与安全动因,也必然带来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安全化;族裔身份则成为二者关系发展的“粘合剂”和“加速器”,身份政治的影响力同步凸显。从政治忠诚指向来看,土库曼人对土耳其有天然的亲近感,土耳其也成为他们在动荡地区形势下的主要外部依靠,然而他们同时也希望保持自己的所在国公民身份。在相互重新发现的过程中,土库曼人对突厥身份和土耳其的认同快速上升,逐步将土耳其视为“精神上的祖国”,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对伊拉克或叙利亚的国家认同。他们在所在国境内被称为土库曼人,一旦跨越国界仍然被称为“伊拉克人”或“叙利亚人”。从政治愿景来看,土库曼人既希望获得所在国的制度化合法地位以及相对于阿拉伯人的独立性或自治地位,但又反对库尔德人建立独立的自治主体,担心自己被边缘化和受到更多压制。土耳其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土库曼人等各方均有着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对土库曼人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同情和支持,但二者关系也受到土耳其与其他族群关系的显著影响。在地区形势持续动荡和安全威胁加剧的背景下,土耳其希望将伊叙两国的土库曼人打造为“亲土耳其势力”,甚至是本国“代理人”,塑造周边安全地带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叙伊两国土库曼人也对土耳其抱有更高期待,在得到土耳其的积极回应之后对突厥身份的认同趋向强烈,进而与土耳其的中东政策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却又因各自国内形势差异而与土耳其的互动关系表现出不同特征。

二、叙利亚土库曼人：土耳其的忠实代理人

叙利亚的土库曼人主要生活在该国北部的拉塔基亚、伊德利卜、阿勒颇和拉卡等省份,在霍姆斯等中南部省份也有分布,总体上呈散居状态,并与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交错混居。历史上,叙利亚土库曼人作为少数族裔备受歧视与打压,叙利亚政府不愿承认土库曼人的少数民族身份,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禁止相关语言教育和出版物,多数土库曼人已转为讲阿拉伯语,民族文化身份模糊,更无法获得重要的权力职位,长期被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与此同时,由于 20 世纪后期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关系长期不睦,土库曼人被叙政府视为土耳其潜在的“第五纵队”而受到严密防范。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库曼人看到了维护其权利地位并最终获得合法承认的历史性机会。历史与现实因素促使叙利亚土库曼人寻求承认其独

特的民族权利和地位,期待在改变叙利亚政局后能保障其文化和语言权利,因此积极参与反政府斗争和叙利亚反对派运动,开始追求新的身份定位。^①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地缘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深度介入叙利亚事务,保护和支​​持同族同源的土库曼人权利与安全成为土耳其的干涉理由之一。面对阿拉伯世界的乱局,埃尔多安认为土耳其有神圣的义务对曾是奥斯曼帝国属地的叙利亚发号施令,表现出“新奥斯曼主义”的帝国情怀。^②在土耳其支持下,土库曼人组织起政党与武装力量,不仅对抗叙利亚政府军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与库尔德武装直接作战,是土耳其对叙干预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服务于土耳其的地区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土耳其的忠实“打手”和地区代理人。

第一,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干涉叙利亚内政的重要借口与抓手。

国际战争会导致国家拥有更多利益或动机去采取各种方式支持和动员敌对国家的少数民族群,以求削弱敌对国家。^③叙利亚危机爆发后,土耳其致力于颠覆巴沙尔政权,支持和扶植土库曼人成为重要手段。与海湾国家不同,土耳其更为依赖基于共同种族(特别是土库曼人)或意识形态招募的中间人来支持叙利亚反对派。^④在土耳其支持下,叙利亚土库曼人成立反对派政党和反政府武装,积极参与反政府活动、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土耳其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为叙利亚土库曼反对派团体提供了重要机会,这些团体期待在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政府中获得更大权力。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境内和流亡中的土库曼人在土耳其支持下成立了“叙利亚土库曼人联盟”,后分化形成了“叙利亚民主土库曼运动”(Syrian Democratic Turkmen Movement)、“土库曼人议事会”(Turkmen Shura)等政治派别,2012年12月又合并成立“叙利亚土库曼大会”(Syrian Turkmen Assembly),总部就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还积极扶持叙利亚西北部土库曼人群体成立各类政治团体,在控制区内开展土耳其语教育,推行“土耳其化”

① Nicholas Heras, “Syrian Turkmen: In Pursuit of a New Syrian Identity,” *Fair Observer*, June 6, 2013, https://www.fairobserver.com/region/middle_east_north_africa/syrian-turkmen-pursuit-new-syrian-identity/, 上网时间:2022年3月19日。

② 李云鹏:《土耳其介入叙利亚危机的策略》,载《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7期,第12页。

③ 王凯:《国际战争与国内族群政治——伊拉克库尔德人运动的历时比较研究》,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4期,第120页。

④ Bayram Balci and Nicolas Monceau, eds., *Turkey, Russia and Iran in the Middle East*,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21, pp. 59-61.

政策。^① 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Council)最初并不愿意承认土库曼人是叙利亚人,但在土耳其干预后将土库曼人纳入其中,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力量之一。2019 年,“叙利亚土库曼大会”才将其办公室从伊斯坦布尔迁至“叙利亚自由军”控制下的叙北边境地区。叙利亚土库曼反对派领导人声称,土耳其是土库曼人的文化“父国”,同时土库曼人致力于建设一个多元化、领土完整的叙利亚。虽然有近 40 万叙利亚土库曼人流入土耳其,但土耳其政府并不愿让这些人人籍,更希望他们留在叙利亚,成为接受土耳其保护、服务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的代理人。现实中的叙利亚土库曼人比阿拉伯人更难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因为土耳其希望这些人留在叙利亚。^②

在军事上,土耳其支持叙利亚土库曼人组建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与物质援助及军事训练,用以对叙利亚政府军作战。2012 年,土耳其协助“叙利亚土库曼大会”组建武装力量“叙利亚土库曼旅”(Syrian Turkmen Brigades),并由土耳其特种部队军官负责培训,其成员数量一度超过 1 万人,也作为“叙利亚自由军”(FSA)的一部分而存在。该组织毫不掩饰与土耳其的密切关系,以土耳其民族主义、“新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为意识形态,将土耳其、土耳其民族主义组织“灰狼”(Grey Wolves)以及逊尼派极端组织“支持阵线”等视为盟友,以叙利亚政府军、“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的“叙利亚民主军”为敌人。“叙利亚土库曼旅”下属武装团体众多,如“苏丹穆拉特旅”(Sultan Murat Brigade)、“阿卜杜勒·哈米德汗旅”(Abdul Hamid Han Brigade)、“苏丹穆罕默德征服者旅”(Sultan Muhammad al-Fateh Brigade)、“苏莱曼沙联盟”(The Suleyman Shah Union)等,^③明显与奥斯曼帝国历史密切相关。叙利亚土库曼武装活跃在拉塔基亚的土库曼山(*Jabal al-Turkman*)地区和阿勒颇市及其郊区,各方对这些地区的争夺尤为激烈。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之后,土库曼武装多次攻击俄罗斯军队,包括使用无人机袭击俄军基地和机场。2015 年 11 月 24 日,俄罗斯一架苏 24

① 王晋:《叙利亚重建的困境、归因与超越》,载《西亚非洲》2019 年第 1 期,第 7 页;王晋:《盟友还是对手?俄罗斯与伊朗、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关切与挑战》,载《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56 页。

② Caroline Hayek and Ahmad Roumi, “The Turkmen: Their Heart in Syria, Their Mind in Turkey,” *Al-Monitor*, February 20, 2020, <https://today.lorientlejour.com/article/1207121/the-turkmen-their-heart-in-syria-their-mind-in-turkey.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2 日。

③ Arslon Xudosi, “Syrian Turkmen Groups in Latakia: An Overview,” *Bellingcat*,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bellingcat.com/news/mena/2019/02/07/syrian-turkmen-groups-in-latakia-an-overview/>,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5 日。

战斗机被土耳其 F-16 战机击落,飞行员跳伞后被当地的“土库曼旅”武装分子打死,一架前去救援的俄军直升机也被击落,“土库曼旅”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此事,事后遭到俄军报复性打击。经过多次军事行动,叙利亚北部已成为土耳其影响下的控制区,土库曼武装人员正部署在土耳其控制区内。

总体来看,叙利亚土库曼反对派武装在内战期间一直依靠土耳其提供支持和保护,并配合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土库曼反对派武装团体数量相对较少且分散,他们保护控制区安全的能力较为有限,依赖土耳其的支持。

第二,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重要帮手。

作为同样遭受压制的少数族裔,叙利亚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愿景具有相似之处,但并未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走到一起,反而在土耳其的影响下完全走向对立。一方面,与阿拉伯人一样,叙利亚土库曼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北部的自治与分离主张。在靠近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到东北部的拉卡省等地居住的土库曼人,往往与库尔德人交错杂居、难以完全分开,库尔德人的崛起及其建立自治区的前景使土库曼人充满担忧。虽然库尔德人对外宣称所建立的自治区将是多元化、多民族共存的,但土库曼人认为,库尔德人试图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一个自治的“西库尔德斯坦”,会威胁土库曼人的生存,导致成千上万的土库曼人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库尔德人势力日益壮大并对土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土耳其政府的心腹大患。^① 2014 年之后,打击库尔德人武装取代推翻巴沙尔政权成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首要目标。土耳其转而采取旨在限制库尔德分离主义组织的战略,这种战略方向的转变是国家安全威胁上升和国内政治变化的产物。^② 从战略意图来看,土耳其积极介入叙利亚危机主要是出于维持边界安全和打击库尔德人力量的考虑。^③ 在土耳其政策的影响下,叙利亚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并走向对立与对抗。

在此背景下,土库曼反对派武装与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领导的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SDF)和“人民保卫军”(YPG)持续发生冲突。土耳其推动建立叙北“安全区”,力图使之成为遏制库尔德力量、维护自身安全并同域内

^① 唐志超:《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2期,第19页。

^② Hasan Kösebalaban, “Transformation of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oward Syria: The Return of Securitization,”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 29, No. 3, 2020, p. 335.

^③ 刘冬:《叙利亚危机的历程、影响与重建前景》,载《中东研究》2021年第2期,第56页。

外各方进行利益博弈和权力竞争的依托。^① 2016 年以来,在土耳其发起的代号为“幼发拉底河之盾”“橄榄枝”“和平之春”“春天之盾”等历次叙北军事行动中,库尔德人是主要打击目标,土库曼武装都积极参与其中并被部署到土耳其占领和建立的叙北“安全区”。同时,土耳其支持和纵容“土库曼旅”等叙利亚反对派武装进攻库尔德人地区,土库曼武装对库尔德人的攻击也较为凶悍和残忍,多次传出肆意杀害库尔德人的消息。例如,在 2019 年 10 月的土耳其“和平之春”军事行动中,“苏丹穆拉德旅”武装人员杀害了库尔德女性政治家赫夫林·哈拉夫(Hevrin Khalaf)以及一些平民。^② 由此可见,土库曼武装成为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的忠实支持者和“打手”。

第三,叙利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周边地区干涉行动的雇佣兵来源。

随着叙利亚战场形势的巨大变化,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反攻之下,“叙利亚自由军”特别是土库曼武装日益依赖土耳其的保护,发展成为土耳其控制下的一支代理人武装,其不仅为土耳其在叙利亚的政策目标服务,也逐步服务于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其他干涉行动。2020 年以来,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兵成为土耳其干涉利比亚内战、纳卡冲突的有力工具,并助其成功实现了地缘政治目标。2020 年上半年利比亚内战激化后,土耳其为支持利西部“民族团结政府”,陆续从叙利亚派遣了数千名武装分子进入利比亚境内作战,帮助西部政府击败了哈夫塔尔领导的东部“国民军”的进攻。据称,这些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兵多数为土库曼人,隶属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土库曼旅”下的“苏丹穆拉德旅”和“苏丹穆罕默德征服者旅”等团体,土耳其政府为这些武装人员直接提供报酬。^③ 2020 年 10 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爆发新一轮纳卡冲突后,又有来自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的数千名雇佣兵被土耳其部署到纳卡地区,助力土耳其支持的阿塞拜疆夺回纳卡大部分地区。因此,来自叙利亚的雇佣军和自身的武装无人机一起成为土耳其干涉周边地区热点冲突的利器,土库曼人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的作用已外溢至地区其他国家。这既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也凸显了土耳其与叙利亚土库曼人之间非对称的代理人关系特征。

^① 刘辰、马晓霖:《土耳其叙北安全区政策的动因与走向分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 年第 6 期,第 25 页。

^② “Turkish-backed Rebels Leave Trail of Abuse, Criminality in Syria’s Afrin,” *Al-Monitor*, July 22, 2021,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1/07/turkish-backed-rebels-leave-trail-abuse-and-criminality-syrias-afrin>, 上网时间:2022 年 4 月 10 日。

^③ Caroline Hayek and Ahmad Roumi, “The Turkmen: Their Heart in Syria, Their Mind in Turkey,” *Lorient Today*, February 20, 2020, <https://today.lorientjour.com/article/1207121/the-turkmen-their-heart-in-syria-their-mind-in-turkey.html>,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8 日。

三、伊拉克土库曼人：土耳其勉为其难的“伙伴”

伊拉克土库曼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地区的摩苏尔、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城市及其周边的城镇和农村,约60%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其余是什叶派或其他教派。^①历史上,土库曼人紧邻库尔德人聚居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一向比较紧张。现代伊拉克建国之后,土库曼人又受到占主体地位的阿拉伯人的压制,两个族群之间也缺乏信任。在伊拉克两大民族(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以及三大族群(什叶派阿拉伯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博弈争夺中,土库曼人作为更为弱勢的少数民族,经常受到波及甚至沦为牺牲品。1991年海湾战争前后,伊拉克政府镇压库尔德人起义时,土库曼人也连带遭受重创。在此前后土库曼人开始组建自己的政党组织,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土库曼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改善,获得了组建政党、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中享有议席、接受民族语言教育等权利,族群的合法地位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受到伊拉克战后美国持续的军事行动、逊尼派叛乱活动和三大族群间冲突的严重冲击,土库曼人的安全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土库曼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同时受到什叶派阿拉伯人控制的中央政府的打压,三方就基尔库克等争议地区的地位存在矛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土库曼人社群更是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当什叶派土库曼人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目标后,数十万土库曼人流离失所。“伊斯兰国”组织式微之后,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伊拉克中央政府围绕基尔库克等地展开了激烈争夺,土库曼人的诉求继续遭到忽视。

总体来看,伊拉克土库曼人是一个人口较少、政治影响力较小的族群,缺乏足够的权力和凝聚力,内部存在教派差异和政治分裂。土库曼人在伊拉克国内处于较为边缘化的地位,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其面对其他强势族群的脆弱性。土库曼人认为自己被其他群体排斥、忽视和边缘化,强调其在当地的长期生活历史并主张像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②在此背景下,很多伊拉克土库曼人期待来自土耳其的支持。对于土耳其来说,伊拉克土库曼人有利于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和制衡库尔德人的独立野心,也有助于其在伊拉克北部扩大政治影响力和

^① Erşat Hüzmüzlü, “The Turkmens of the Middle East,”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Vol. 14, No. 1, 2015, p. 87.

^② Salih Moustafa, “Kirkuk Conflict in Its Ethnic/Political Media: the Turkmen Newspaper Alqal’a as a Model,” *National Identities*, Vol. 18, No. 3, 2016, p. 271.

获取石油等现实利益。然而,由于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土库曼人群体的内部分裂,土耳其与土库曼人之间难以形成明确的代理人关系,其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的角色呈现为模糊而尴尬的伙伴形象。

第一,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保持对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地缘影响力。

从历史角度看,一战后失去摩苏尔省令土耳其人耿耿于怀,国内部分民族主义者至今对此念念不忘,伊拉克摩苏尔及周边地区的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保持地缘影响力的重要现实基础之一。冷战结束后,土耳其是伊拉克土库曼人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外部支持力量,并一直使用土库曼这张牌作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工具。^① 在土耳其支持下,1995 年土库曼人政治组织联合成立了“伊拉克土库曼阵线”(Iraqi Turkoman Front, ITF),成为伊拉克土库曼人的主要政治代表,土耳其还支持召开 1997 年首届伊拉克土库曼民族大会以及后续历届会议。土耳其积极帮助“伊拉克土库曼阵线”扩大影响力,制衡在北部地区势力扩张的库尔德人,该组织也一直寻求土耳其的更大支持。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对土库曼人的支持逐步扩大。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成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的保护人,成为影响伊拉克局势的关键组成部分。^② 伊拉克土库曼人声称,包括基尔库克、塔尔阿法尔、埃尔比勒、曼达利、摩苏尔和图兹库尔马图等伊拉克北部地区是“土库曼人的家园”,这明显有所夸大,并与库尔德人的要求相冲突。土耳其政府反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独立以及吞并基尔库克的主张,并要求保障土库曼人的利益,基尔库克成为两个族裔争夺的焦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兴起后,土耳其军方有计划地在伊拉克北部训练土库曼武装人员,高峰时期约有 4,000 名土库曼武装人员参与对“伊斯兰国”作战,并仿照叙利亚模式在伊拉克组建“土库曼旅”。土耳其也推动伊拉克土库曼人与逊尼派阿拉伯人开展合作,成为二者事实上的“保护人”。土耳其投资者和宗教组织还通过族裔纽带支持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教育发展,以保护其族裔身份和巩固在当地的存。^③ 因此,外界认为“伊拉克土库曼阵线”受

^① Güldem Baykal Büyüksaraç, “Trans-border Minority Activism and Kin-state Politics: The Case of Iraqi Turkmen and Turkish Interventionism,”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Vol. 90, No. 1, 2017, pp. 36-37.

^② Şaban Kardaş,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raq: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8, No. 3-4, 2021, pp. 137-138.

^③ Kelsey Shanks, “The Changing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Iraqi Disputed Territories: Assimilation, Segreg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Vol. 14, No. 3, 2016, p. 427.

到土耳其的操纵,是土耳其干预伊拉克的工具。^①

然而,伊拉克土库曼人和“伊拉克土库曼阵线”在历次选举中得票率较为有限,无法决定地方格局,更难以影响全国局势。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的多重分裂又极大分散和弱化了土库曼政治运动的力量,其有限的武装力量更无法与库尔德人相提并论。逊尼派与什叶派土库曼人之间的不信任不断加剧,什叶派怀疑逊尼派与土耳其结盟,而逊尼派认为什叶派是伊朗利益的延伸。^② 经过“伊斯兰国”的肆虐,什叶派土库曼人对土耳其呈现出更深的的不信任甚至是敌意,加剧了双方关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虽然“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一直试图联合所有土库曼人,但“土库曼民族运动”等组织独立参加选举,而相当一部分什叶派土库曼人更愿意加入“土库曼伊斯兰联盟”(Turkmen Islamic Union)或由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领导的“伊拉克团结联盟”(United Iraqi Alliance)。土耳其不得不将很大精力放在调解土库曼人内部的宗派与政治矛盾上,加之库尔德自治政府是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导致土耳其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支持有限且不稳定。

第二,土耳其利用土库曼人制衡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

伊拉克北部山区长期是库尔德工人党的总部和训练营所在地,这是土耳其在伊拉克的首要安全关切。20年来土耳其经常对库尔德工人党开展跨境打击行动,除传统的库尔德工人党躲藏地甘迪勒山区,“阿拉伯之春”以来库尔德人在辛贾尔地区建立的据点和附属组织“辛贾尔保护组织”(YBS)也逐步成为土耳其的打击目标。伊拉克战争后,土耳其对库尔德人高度自治带来的安全担忧加剧,为制衡库尔德人,土耳其将土库曼人确定为关键的战略关注和扶植对象。^③ 2017年库尔德地区一意孤行举行独立公投,土耳其对其开展制裁,并联合伊拉克和伊朗政府进行了打压。对土耳其来说,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独立建国的想法和将基尔库克纳入库尔德自治区(KRG)的企图都是不可触碰的红线。^④

伊拉克土库曼人一直担心被排除在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主导的领土解决方

^① Fehim Tastekin, “Why Iraqi Turkmens Are Excluded from the New Government,” *Al-Monitor*, October 30, 2018,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18/10/turkey-iraq-new-administration-excludes-turkmens.html>,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7日。

^② Dave van Zoonen Khogir Wirya, “Turkmen in Tal Afar: Perceptions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nflict,” *Middle East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Report, July 2017, p. 4.

^③ Pinar Tank,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the Iraq War on the Kurdish Issue in Turkey,” *Conflict, Security & Development*, Vol. 5, No. 1, 2005, p. 69.

^④ [荷兰]马丁·范·布鲁尼森:《土耳其与摩苏尔省及库尔德人的关系: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到“伊斯兰国”的出现》,第180-181页。

案之外,并希望在他们占多数的地区进行某种形式的自治安排。土库曼人认为自己才是基尔库克以及周边地区唯一的原住民,不接受库尔德人对基尔库克等地的管治要求。土库曼人希望改变不利状况并保护自身权益,为此愿意接受土耳其的援助,支持土耳其在叙伊两国北部设立“安全区”,这为土耳其介入提供了机会。土耳其多次警告库尔德人不得改变基尔库克的人口结构,就是希望通过干预基尔库克问题牵制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①“伊拉克土库曼阵线”主席兼基尔库克议员埃尔萨德·萨利希曾表示,由于叙利亚和伊拉克缺乏安全和持续发生冲突,土库曼人不断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应被宣布为“安全区”,基尔库克不是“库尔德斯坦”的一部分,摩苏尔、塔尔阿法尔也是土库曼人居住的重要城市,它们的未来必须由土库曼人决定。^②2017 年打败“伊斯兰国”之后,伊拉克各方对基尔库克的争夺一度导致出现新的战争风险,这是土耳其所不愿意看到的。^③2017 年库尔德自治政府将基尔库克纳入独立公投范围,遭到当地土库曼人和阿拉伯人的联合抵制,土耳其对库尔德人进行了警告。埃尔多安重申了土耳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基尔库克在历史上是一个土库曼城市,指责库尔德自治区政府是“占领行为”,并称这将付出代价。^④土耳其在基尔库克训练并武装的土库曼民兵部队,在投票举行前与库尔德人发生了冲突。这表明土耳其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分裂,并利用土库曼人抵制公投,不允许完全由库尔德人控制基尔库克。^⑤2019 年以来,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先后开展代号为“鹰爪”“虎爪”“闪电爪”“霹雳爪”和“爪锁”的系列军事行动,扩大了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在遏制库尔德人这一关系到自身核心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与土库曼人的利益一致,合作更为密切。

第三,土耳其利用伊拉克土库曼人协助控制和获取石油资源等现实利益,但利益关联较为脆弱。

^① 敏敬:《石油重镇基尔库克归属问题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0 年第 3 期,第 48 页。

^② Sibel Uğurlu, “Turkmen Continue to Suffer in Syria, Iraq, Kirkuk MP Says,” *Anadolu Agency*, March 1, 2016, <https://www.aa.com.tr/en/politics/turkmen-continue-to-suffer-in-syria-iraq-kirkuk-mp-says/529403>,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12 日。

^③ Othman Ali, “Kirkuk, Iraq’s Next War: What Options Does Turkey Have?,” *Insight Turkey*, Vol. 19, No. 4, 2017, p. 29.

^④ “Erdogan: Take Down the Kurdish Flag in Kirkuk or Pay a Price,” *Rudaw*, April 4, 2017,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40420173>, 上网时间:2022 年 3 月 20 日。

^⑤ Bill Park, “Explaining Turkey’s Reaction to the September 2017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in the KRG: Final Divorce or Relationship Reset?,”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1, 2019, p. 52.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土耳其与伊拉克就签署了建造一条输油管道的协议,将基尔库克的石油经土耳其东南部输送至地中海港口杰伊汉,这使得土耳其从中获利颇丰。数十年来,伊拉克内部各派对北部石油资源的争夺此起彼伏,伊拉克政府为控制石油产地还曾有计划地将当地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驱逐出去,加之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持续冲突,这均让土库曼人深受波及。对于土耳其来说,支持土库曼人维护自身权益有助于其保留在伊拉克北部石油产地的话语权,维护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伊拉克北部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严重缺油少气的土耳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土耳其一直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最重要的贸易方,改善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对土耳其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价值。^① 而影响土耳其稳定获取伊拉克石油资源的主要因素是库尔德人,土耳其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总体上保持积极和稳定,石油资源开发以及反对库工党威胁的共同利益是双方关系的主要纽带。基于共同战略和商业利益的能源关系将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联系在一起,并有可能将其在该地区的其他敌人聚集在一起。^② 因此,土耳其曾多次要求土库曼人与库尔德自治政府保持合作,甚至迫使其容忍库尔德人的势力扩张,导致土库曼人陷入尴尬境地。实力差距、能源和经济利益的错位决定了土耳其对土库曼人支持力度有限且起伏波动,这引起土库曼人的不满,甚至影响到双方的合作关系。自 2017 年伊拉克政府收复摩苏尔以来,土耳其筹划建立绕开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土伊新口岸,以畅通与土库曼人及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系通道。^③ 这将有助于土耳其减少对库尔德自治区的经济通道依赖,扩大其在伊拉克北部的政策选择,但依然无法改变土耳其与当地土库曼人利益关联脆弱的现实。

四、结论

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是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动力。^④ 正发党上台后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土耳其的周边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库尔德问题和

① 成振海:《伊拉克土库曼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及其政治前景探析》,第 109 页。

② John V. Bowlus, “A Crude Marriage: Iraq, Turkey, and the Kirkuk — Ceyhan Oil Pipelin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3, No. 5, 2017, p. 741.

③ Şaban Kardaş,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raq: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28, Issue 3-4, 2021, p. 139.

④ 李秉忠:《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力:安全诉求和地缘政治抱负》,载《当代世界》2018 年第 11 期,第 56 页。

大国抱负两大国内因素的驱动。库尔德问题是土耳其在周边地区的核心安全关切,主要表现为对库工党及其附属组织的打击;大国抱负包括成为全球中心大国和在周边地区的领导地位,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抱负。这在土耳其对东南部两个邻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外交政策上表现明显。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族裔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在相互重新发现和认同增强的过程中,西亚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伙伴与有效工具。在库尔德问题和大国抱负这两大基本驱动因素的基础上,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土库曼人的历史与族裔联系更加凸显,成为推动双方关系深化发展的“粘合剂”和“加速器”,共同影响着土耳其的周边外交。由于土库曼人和土耳其人的亲缘关系,土库曼人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① 身份认同成为影响双方关系的一个更为独立的因素,土库曼人既是土耳其周边外交的工具,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政策目标的一部分,这为“新奥斯曼主义”注入了更大发展动力,身份认同政治化的外溢效应更加凸显。

土耳其与西亚土库曼人的关系也提供了一个观察主权国家与邻国少数民族群关系的绝佳案例。由于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失败,库尔德人、土库曼人作为少数族裔拒绝被同化和边缘化,这种“外围民族主义”^② 趋向强烈。在族裔认同、地缘政治和库尔德问题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土耳其支持土库曼人保障自身权利和扩大影响力,并通过积极拉拢与援助试图将之培养为自身的代理人,服务于其野心勃勃的周边外交目标。然而,受到叙伊两国国内形势、土库曼人特点和土耳其与两国政府及相关行为体关系差异的影响,土耳其在叙伊两国的政策目标和介入程度不同,与两国土库曼人的互动方式及其政策效果也存在差异。土耳其对叙利亚国内局势的介入程度更深,对叙政策目标更为宽泛,因此对叙利亚土库曼人的支持力度更大,叙土库曼人也主要依靠土耳其的直接支持和保护而生存,为土耳其的地区干涉政策冲锋陷阵,代理人色彩更为显著。相对而言,土耳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较为有限,并受到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库尔德自治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制约,因此对伊拉克土库曼人的支持表现出有限性与不稳定性特征。而且伊拉克土库曼人已获得了国内合法地位,内部派系复杂,安全威胁与政治诉求不同,保持了更大的独立性,土耳其对其定位并不清晰。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对于土耳其的态度存在明显争论和日益扩大的分

^① Ibrahim Sirkeci, “Turkmen in Iraq and Their Flight: A Demographic Question,” *Centre for Middle Eastern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21, 2011, p. 11.

^②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72–82.

歧,部分土库曼团体明确拒绝扮演土耳其的代理人。

从影响来看,土耳其与周边土库曼人的认同增强和利益捆绑,进一步撕裂了周边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不利于民族和解与国家重建,加剧了地区国家政治与治理格局的碎片化和脆弱性。西亚土库曼人在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虽然发挥出一定作用,但受制于诸多因素,对于土耳其周边外交来说效应有限并呈现递减趋势。

首先,各国土库曼人内部形势、力量强弱和组织程度不同,对土耳其的认同度也不相同,配合土耳其外交的意愿与能力存在差异。无论是叙利亚还是伊拉克的土库曼人,从现实来看都不是国内局势的决定性力量,均难以成为土耳其周边外交的重要支柱。叙利亚土库曼人更依赖土耳其的支持和保护,虽较为团结并组建了武装力量,但在各方势力介入和叙利亚政府军强势复苏背景下自保都困难。伊拉克土库曼人内部力量分散,教派与政治分裂明显,缺乏有力的武装力量,无法对土耳其形成一致而直接的支持。

其次,周边国家内部各方势力和族群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土耳其也与其他族群及有关势力保持着多元联系和互动关系,如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拥有较为稳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关系。因此,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土库曼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甚至存在严重矛盾。

最后,周边国家形势受到外部大国和国际体系格局的结构性影响,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等多方力量纷纷参与其中,事实证明叙利亚局势和伊拉克局势均超出了土耳其一国所能掌控的范围。美、欧、俄等外部大国并不支持土耳其在叙伊北部的强势作为,甚至还存在重大矛盾,这导致土耳其周边外交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土耳其政府对土库曼人诉求的回应与支持也随着形势发展而不断变化。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 远)